

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我所知道的

# 军统

● 文闻 / 编

为非作歹 残民以逞

因独裁政权而疯狂

洞烛其奸 彰显邪恶

以廓清历史为己任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我所知道的

# 军统

文闻/编

为非作歹 残忍以逞

因独裁政权而疯狂

洞烛其奸 彰显邪恶

以廓清历史为己任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军统/文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ISBN 7 - 5034 - 1434 - 0

I. 我... II. 文... III. 军统局 - 史料 IV.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150 号

**《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我所知道的军统**

责任编辑: 杨玉文

封面设计: 王 莖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1.375 字数: 286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70.00 元 (全四卷) (本册定价: 17.5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和演变 .....	( 1 )
□复兴社的组成和特务处	□军统特务组织的扩建
□保密局阶段	
军统局初创期三个月见闻 .....	(119)
□军统局的起源	□组织编制和工作范围
□经费来源	
军统及保密局内幕见闻 .....	(124)
□军统的对内控制	□军统的斗争目标
□军统(保密局)的盛极而衰	
毛人凤与特警班同学会 .....	(152)
军统的特务训练 .....	(156)
□特务训练与军统的发展	□各训练班概述
□训练班的组织机构	□骗取青年的方法种种
□训练的内容和方式	□参加受训与加入军统特务组织
□毕业与工作分配	
军统局每年举行的“四一大会”概述 .....	(208)
军统特务电讯机构内幕 .....	(212)
在军统重庆无线电通讯总台的经历 .....	(217)
军统特技室的密码战 .....	(225)
□特种技术的由来	□复兴社重视密码侦译
□抗战时期的军统特技室	

- 军统局的经济情报机构…………… (233)
- 中心机构经济研究室   干部训练班   外围组织
- 军统临黔息兰四个特训班的概况 …… (255)
- 临澧特训班   黔阳特训班   息烽特训班   兰州特训班
- 军统临训班见闻…………… (262)
- 临训班内幕种种…………… (269)
- 忆军统第三期息烽训练班…………… (280)
- 息烽特训班的回忆…………… (287)
- 军统兰训班第一期受训记…………… (300)
- 军统兰训班内幕…………… (306)
- 训练前的形形色色   新生入伍及校内情况   参加特务组织履行的手续   特务训练课程   曾扩情领喊“蒋委员长精神不死”   特务训练班的“实习”   戴笠与兰训班   毕业典礼和新生入学典礼   个别谈话与分化工作
- 不愿做特务被军统折磨死的三个青年…………… (325)
- 朱文江在兰州跳黄河自杀   张永康服鸦片烟自杀   靳家友被庸医割扁桃腺治死
- 军统南平无线电训练班亲历记…………… (335)
- 一则广告百人上当   四合“碉堡”插翅难逃
- 开学典礼恩威并济   培养奴性为虎作倀   战火纷飞随班迁闽   复课甄别进入专业   报务员的基本功   各具台名通讯实用   禁闭室内二女三男   一杯血酒前途无量   最后一课言传身教
- 待命出发各奔前程

# 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和演变

## 复兴社的组成和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省市的广大工农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热潮。约11月，蒋介石召集了一部分他最亲信的黄埔学生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邓文仪、戴笠等，在他官邸开会。蒋介石现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传统精神完全丧失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蒋一贯善于用刺激和谩骂的口气要部下和学生去猜测他的心思，而这些善于逢迎的学生，也很明白这位校长的脾气。贺衷寒提出来要团结才有办法，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地往下逼问：你们怎样才能团结得起来？但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得到结果，12月，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是下野了，但怎么才能团结的办法也必然要加紧筹划。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到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起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赶快搞成那个能团结的组织。贺衷寒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给蒋介石，蒋都收了起来。关于组织的名称，大家又有一番研究。黄埔一期学生鄞梯向蒋介石建议，以国民党青年军人为基干，组织“救亡社”，但由于范围太广，未被

我所知道的军统

采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训处处长刘健群著有《蓝衣社》一书，他向蒋介石建议仿效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之黑衫党，组织“蓝衣社”。而贺衷寒、邓文仪、滕杰等人，以宣扬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为名，联合建议组织“力行社”。经蒋介石批准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力行社”，其主要发起人为贺衷寒、邓文仪、潘佑强、桂永清、郑介民、葛武攀、梁干乔、肖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刘健群也加入了发起人，共为十三人。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所称的“十三太保”。其实，所谓的“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团结”的一群骨干分子，他们不止是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是哪十三人，有人还提出曾扩情、鄞悌、周复、戴笠等都在其内。所以与其说“十三太保”，不如说就是这一群当时酝酿人的总称。

“力行社”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组织，为扩大反动组织，遂用“中华民族复兴社”名义，作为发展组织的名称（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复兴社设干事会和监察会，总社设有书记，第一任书记是滕杰（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书记是贺衷寒（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第三任书记是鄞悌（1934年8月到1935年10月），第四任书记是刘健群（1935年10月到1937年9月），其间从1936年8月到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第五任书记是康泽（1937年9月到1938年4月）。前三人都称书记，轮到刘健群和康泽时，蒋介石改称其为书记长。干事会设干事31人，后补干事20人，干事会下设总务处、组织处、军事处、训练处、宣导处、特务处等六个处。当过处长的：总务处处长张辅邦，组织处处长贺衷寒，军事处处长桂永清，训练处处长梁干乔，宣导处处长康泽。这五个处的处长，都由所谓“十三太保”的那批人先后担任过。只有特务处处长的位置，始终是戴笠担任，从未换过人。监察会则设监察21人，后补监察10人，书记1人，另

设书记处、考核处、调查处、纪律处等四个处。复兴社在各省市设有分社，各分社设有干事会和监察会，分社之下设有若干区社。除分社之外还有直属区社和直属小组。在复兴社直属组织之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外围组织，如正谊社、忠勇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青年社、少年社。还有故意混淆名称的力行社，以作为核心组织“力行社”的掩护。

复兴社在蒋介石政权内部，与二陈 CC 系和政学系进行明争暗斗，争地争人，争夺权力，短兵相接，剧烈异常。在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为了标榜其抗日的“真心”，撤销了复兴社，复兴社的中心工作便由国民党三青团以及由复兴社留下的特务处扩建的军统局继续。

虽然军统局是由复兴社特务处存留下来后扩建的组织，但在性质上同复兴社是有区别的。我在军统局局本部担任了五年多人事行政工作，对于军统与复兴社的关系，应该在这里说明白。一般人常对戴笠的军统局与复兴社的组织混淆不清，其实军统局与复兴社是有区别的。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但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的组织与人事以及活动，都有其独立性。它以戴笠为首，形成单独的组织，吸收人员也有其特殊的组织手续。军统局人员有些参加过复兴社，而且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但不是人人均参加过复兴社。一般地说，复兴社是蒋介石御用而带有特务性质的一种派系组织，复兴社的社员中有些也是要做特务工作的，但不是人人做特务工作，这就不能视之为职业特务。特务处是寄生在复兴社内部，为蒋介石亲自领导的专门化特务机关，其全部人员都是终身职业化的特务。所以说特务处虽与复兴社有密切关系，但不是同一特务性的组织。

### （一）特务处的产生

提起特务处，一般人大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也不知道军统就是从特务处开源的。戴笠是蒋介石亲自钦赐的特务处



处长。当时复兴社组织里干事会的干事，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三、四期的毕业学生，戴笠不过是一个黄埔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论资历是不可能做到干事会的候补干事，更不可能充当处长。但是，戴笠竟被蒋介石看中了，把特务处这样一个掌握特务实权的责任交给了戴笠。

戴笠别号雨农，家乡的小名春风，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保安镇，幼年丧父。兄弟两人，弟名戴春榜又名云林。母亲戴蓝氏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善于操作家务。我于1942年随戴笠去保安，访问了他的母亲。她对人很和蔼，并唠叨地诉说戴笠的脾气不好，劝慰我们多顺着一些，免得惹他发些无名火，大家可以落得一个安静。这次戴笠回到家里，给他母亲带去两斤白木耳和两只火腿，而我们随从的干部合起来向他母亲送了一支野山人参。这是瞒着戴笠送给他母亲的，因为戴笠对部下给他家里送礼是很严厉的。戴的原配毛氏是江山凤林人，也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对人没有架子，生有一个儿子叫戴藏宜，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没有毕业，戴笠对他很严。他在家乡办了一所树德小学，自己担任校长，一直没有出来做过事，但他倚仗父亲的权势，在家乡无恶不作。

戴笠从小在江山峡口镇上读私塾，他喜欢赌博，对于什么牌九、骰子、做宝、麻将等都有一套弄假的本领，因此，遭到家乡人士的厌恶，他就离开江山去杭州流浪。我曾随他出巡东南，住在峡口周王庙时，他沾沾自喜地吹嘘他不仅善于赌博，而且有每赌必胜的本领，由于太调皮了，被家乡人逼得外出，今天很谢谢家乡父老，如果没有当时的唾弃，也就没有今天的地位。戴笠当年到达杭州后，就投入周凤岐师当学兵，也由于夜晚熄灯后偷出营门赌博而被开除出学兵营。他有一个老表张冠夫住在上海，他就去上海投奔，住在张冠夫家中的一间亭子间，日夜在交易所和赌场胡混，就在这里认识了蒋介石、戴

季陶、陈果夫等人。他与戴季陶同是浙江人，就认戴是同族叔叔。由于他很善于跑腿逢迎，很得戴的喜欢。后来，他在报上看到了蒋介石一些事迹的报导，便在1926年去广州投奔戴季陶，经戴介绍给蒋介石，被收容在黄埔军校六期入伍。入伍期满，编入骑兵科训练。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先到了南京，到处搜集一些情报，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派他在身边当了参谋，由蒋身边的秘书胡靖安领导他的工作。时间不久，蒋介石就发给他一笔经费，要他组织一批人从事特务活动，他便和张炎元、黄雍、周伟龙、马策、郑锡麟、梁干乔、徐亮、胡天秋、王天木等十人开始了正式的特务活动，这就是军统以后所称的“十人团”，这个“十人团”就向蒋介石提供情报。这里还要提一下胡宗南。戴笠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他们就有一面之缘。以后，戴经常找胡攀谈，他们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在复兴社中，胡宗南虽然没有负实际责任，但蒋介石特别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那些“太保”们，认为一定有其特殊意义，所以，对他也特别尊重，他自己也俨然以复兴社幕后人自居。他与戴笠的密切关系，也就联系到特务处处长的人选了。1932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开会时，慢吞吞地提出说：“特务处处长就是戴笠好了。”戴笠就这样坐上了特务处处长的宝座。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它以“十人团”为基干，慢慢地发展起来。特务处虽然是复兴社的组成单位，但它办公的总处设在四条巷，接头地点设在鸡鹅巷，总处内勤人员都要有出入证。至于外勤人员，非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不能直接去四条巷，而只能先到鸡鹅巷去接洽，由那里打电话去四条巷，再由总处派人接谈。而复兴社其他处的人员都不能去四条巷特务处总处。特务处的活动是完全受命于蒋介石的，蒋介石对特务处的特务比对别的公务人员要关心，如当时的军事机关都要打

折扣拿“国难薪”，少校 135 元拿 80 元，中校 175 元拿 100 元，上校 240 元拿 120 元，而特务处的特务们则是按实际给生活费，伙食完全由公家包干，比较起来，比一般相同级别的公务员要多拿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外勤兼有公职的虽不许拿双重薪水，但可以拿到活动费和特别费，不兼公职的可以拿到活动费和房租费。当组长、站长、区长的还可以拿办公费。这些当特务的是终身职，当时称为“铁饭碗”，只要肯出卖良心和人格，便无失业之忧。戴笠掌握了特务处实权之后，就规定了终身特务的人事制度，在蒋介石独裁政权的范围内，形成了蒋介石核心组织中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

## （二）特务处的内勤组织

1932 年 4 月 1 日特务处成立时，组织还比较简单。戴笠是蒋介石“钦定”的处长，并指定复兴社的干事郑介民为副处长。郑介民是黄埔军校二期学生，又是复兴社干事，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只是复兴社的候补干事，蒋介石要郑屈居于戴笠之下，郑思想上是不通的，所以他经常去办公，也不去过问戴笠的事。因之，戴笠大权独揽，一切内外工作都凭自己个人去安排。由于郑介民的不过问，他们之间也算得是相安无事。

在特务处里，蒋介石还派了一个管理经费的，他叫徐人骥，是湖南耒阳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是蒋介石侍从室设计委员，蒋介石指派他在军统特务组织管理经费，戴笠对他非常信任。

特务处成立之始，全部特务大约有一百六七十人，总处原先设在鸡鹅巷 53 号，以后迁移到四条巷，将鸡鹅巷改为接头处。除内勤特务外，所有外勤特务没有特殊情形，一般不能进入总处。

在总处主持内部工作的称书记。先后担任书记的有：林

垣、张师、李果谋、俞墉、张严佛、梁干乔、唐纵等。林垣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当过戴笠的教官；张师江苏人，曾去苏联留学，担任过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指导员；李果谋湖北人，留学日本；俞墉浙江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胡宗南介绍的；张严佛湖南人，是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行营调查科1934年合并于特务处；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中央军官学校政训研究班政训组长；唐纵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以后由戴笠介绍在蒋介石侍从室担任第六组组长，是军统组织中的稳健派。总处的内勤组织除书记之外，还有甲室书记。甲室是戴笠的办公室，郑修元、毛人凤、毛万里担任过书记。特务处总处设有行动科、情报科、电讯科、总务股、考核股、会计股、司法股、交通股、督察室、特务队、无线电总台等。以上的内勤组织，随着特务处总处的扩充，会计股扩充为会计科，总务股扩充为总务科，并增设了设计委员会。

行动科是主持特务处有关于行动的计划 and 指挥执行的，如秘密逮捕、暗杀、监禁、破坏等，由戴笠自己兼任科长，以后由陈世贤担任。陈是贵州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

情报科是特务处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环节，下设华东股、华南股、华北股、华中股、国际股、统计股、军事股、缮校股、密函股。外勤各单位搜集的情报，都分类编报总处，在总处是由情报科编审整理上报。这些情报，当时分为报甲、报乙、报丙等几个方面。报甲的情报是报给蒋介石的，报乙的情报是报参谋本部和有关主管机关，报丙的情报是报戴笠察阅和批示的。在情报的处理方面，经过批示后，转交各有关秘密或公开组织处理。情报科由唐纵、刘哲民、傅胜兰先后担任科长。

电讯科是特务处总处的通讯业务指挥设计单位，除建立各地分台和掌握总台通讯外，并且研究和设计小型特务无线电机

的制造和修理。由魏大铭担任科长。魏是浙江平湖人，曾在上海国际电台工作，经胡宗南介绍加入特务处，对于无线电台通讯有实践经验，亦最为戴笠所重视。但在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怀有野心，遭到戴笠的怀疑，曾一度将他软禁。

总务股管理枪枝弹药器材以及各种采购，并负责办理总处内勤特务的伙食；对外的交际事务以及交通运输等，也都由总务股负责办理。股长柴鹿鸣，是戴笠的小同乡。1935年总务股扩建为总务科，科长钟振。

考核股主管人事。特务处特务的调派和生活费的规定，是这个股主办的事务。特务处发展特务，都要经过这个股办理。特务处要吸收派用的人，先由考核股约定日期，去鸡鹅巷谈话，然后签注是否吸收的意见，不予吸收的，就通知他日后再作决定。决定吸收的，在签注意见中可决定派遣工作，也可决定吸收后，再考核派遣工作。对于这两种吸收的人，经过书记或戴笠批准后，考核股就要约定时间举行参加组织宣誓仪式。已签派工作的，通知他去工作单位报到；未签派工作的，再由考核股考虑签派工作。先后担任股长的有胡子萍（董益三注：早期考核股长为刘培初，胡子萍后任交通股长）和李肖白，先后担任副股长的有周启俊和周康，胡子萍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李肖白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周启俊湖北人，周康是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毕业生。

会计股主管经费，不问是收入还是支出都要经过会计股办理。如果是支出，必须会计股审核后呈请书记或戴笠批准。1935年，这个股扩建为会计科。股长林尧民浙江人；在扩建会计科后，由徐人骥担任科长，徐就是由蒋介石亲自向特务处派遣掌握经费的。

交通股主办收信发信，包括秘密通讯的传递。股长陆矩吾（董益三注：是胡子萍），浙江人。

司法股是为特务处维护自己的“法”而建立的。旨在标榜特务处是依“法”行事的。但它所规定的“法”都是根据戴笠的意旨自己制定的。余铎曾担任司法股长，他是江苏人。

无线电总台虽是接受电讯科管辖的，但对各分台的通讯联络，有它的独立性。总台与分台的通讯，其呼号、波长、时间，都是由总台规定行使（董益三注：与总台分台通讯的联络办法完全是第一科规定，总台只是执行而已）。当时由于通讯方面的保密，曾一度制定有特种符号。如普通大写符号为：1.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0. - - - - - 。而特种符号的大写为：1. ·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 8. · · - - - · 9. · - - - - · 0. · - - - - · 。这种特种符号，如果经监听的敌台收听，必然引起怀疑，而长期继续监听，就有被破译的危险，就通令废止了。对于通讯方面的保密工作，就强调在密码方面的保密工作。总台的台长先后由苏民和杨震裔担任过。

译电股是特务处翻译电报的单位，该股还负责研究和制定特务处自己的密码本。特务处的密码本，当时还是比较落后，如加减法，就是一个数字或两个数字加入或减去明码的数字译成电文发出，对方也用加或减得出电文，就是电报全文；还有用诗句加减、活页加减的，使每天的电文都不是固定的加减数字，这在保密方面比较可靠。如果发现电文密码已被敌方破译，对于所发出去的密码本，即通电作废，另换发新的密码本。译电股长是夏天放。

督察是戴笠统治特务处特务的耳目。在总处设有督察，在各外勤组织内部也设有督察，有公开的督察，也有秘密督察。这些督察要向戴笠汇报每一个特务的思想活动，督察的汇报，都由戴笠亲自处理。所以戴笠对于每一个特务的思想情况，了

解得很清楚，尤其是对于中上层特务更是了如指掌。特务处初期的督察是邢山（邢森洲），海南岛文昌县人，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活动，担任过大总统府的设计委员。以后成立督察室，由柯建安、刘培初先后担任主任。

特务队是特务处的便衣警卫，除保卫总处和接头处的安全外，还负责保卫戴笠的安全。该队还设有行动特务，专门搞逮捕、绑架、暗杀、破坏等秘密行动。队长刘乙光。该队还设有看守所，由苏子鹤担任所长。

特务处成立之初，由于人员不多，在内勤组织方面也就比较简单，对外的秘密性很严格，当时在内勤工作的特务，彼此之间不准在工作上互通情况，回到家中也不准向各自的家属谈论内部工作情况。如果为督察查察到有类似情况，就作为泄漏秘密论处。因此，当时在特务处总处的特务，无不守口如瓶，至亲好友，亦不知其究竟在何处工作和做些什么。正因为特务处保守秘密的严密性，当时只知道有一个戴先生（特务称戴笠为戴先生）和鸡鹅巷53号（这是特务处接头处），谁也说不出特务处这个名称。我当时在南京参加特务处，在慧圆里接受训练时，就不知道加入的组织就是特务处。

### （三）特务处的外勤组织

戴笠在复兴社建立之前，就透视了蒋介石的心理，也就是蒋介石自己写过的一张字条：“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十二个字，就是蒋介石要建立复兴社的目的。戴笠就按这个目的向蒋介石提供了进步的、反蒋的、要求抗日的各方面的情报，加之胡宗南对戴笠的推崇，蒋介石就看中了戴笠，把特务处长一职亲自交给了戴笠。戴笠的组织计划是经过蒋介石亲自审批的。总处设在南京，由蒋介石亲自领导。在外勤组织方面，曾一度设有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华北区以及各省的省站，站以下设有组，有些边远省区，没有设站的，就设

立直属组。在区、站、组这三级组织之下，都设有通讯员。

特务处在1934年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之后，外勤组织逐渐完善。调查科领导的各省保安处谍报股，都作为特务处各省站的掩护机关，如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在特务处兼任浙江省站站长，这就是以公开机关掩护秘密机关的活动。在秘密机关作出决定后，运用公开机关的名义去执行。当时特务处设立的省站有：湖南站、湖北站、河南站、安徽站、江西站、浙江站、广东站、华北站等。还有些省只成立了直属组。戴笠这个特务处的班子，在1934年之前，内内外外，只不过是三四百人。大部分的经费，是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中开支的，只是听蒋介石批多少算多少，虽然可以请求多批一点，但还是不敢大胆随意请求。这就使特务处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从接受邓文仪调查课合并的班子后，这些组织机构都是有编制和经费的，并且还可以向所隶属的机关编造预算，请求领发经费。对于特务处的活动，就由“钱”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担任区长、站长的有：北平区区长张炎元、天津区区长王天木、广九区区长邢山、武汉区区长周伟龙、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湖南站站长吴庚恕、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河南站站长刘暨、安徽站站长翁一揆、江西站站长柯建安、浙江站站长翁光辉（一说为童襄）。

#### （四）特务处的发祥基地——浙江警官学校

浙江警官学校是1930年由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创办的，当时由朱家骅兼任校长。在1932年特务处成立后，蒋介石批准将浙江警官学校交戴笠掌握，亲自指定戴笠为该校中央政治特派员。他这个特派员成了浙警校的“太上皇”，总揽浙警校全权，派赵龙文为政治指导员，1934年任校长，并成立了政训处，派王孔安为政训处书记长，由鄞裕坤担任教务主任，史铭担任训育主任，陈玉辉、王蒲臣先后担任总队长。由于为特务处培养骨干，在浙江警官学校的名义内建立了杭州特



训班，这个特训班分设甲训班、乙训班、丙训班、电讯班等四个班，同浙警校正科学生隔离训练。余乐醒是特训班甲训班的副主任，他是湖南醴陵人，法国勤工俭读学生，后又去苏联留学，曾在苏联格伯乌学习过。戴笠对他很重视，希望他能给特务处训练一批有格伯乌本领的骨干。特训班的教官有：谢力公、梁瀚芬、金民杰、朱惠清、管容德、王文钊、苏民、林郁民、汪祖华等。担任指导员的有：文强、罗杏芳、董益三等。担任队长的有廖宗泽、冯国徽等。甲训班是训练高级特务骨干的，毛森、萧勃、阮清源、杨超群、邓墨村、章微寒、周康、郑海良、丁继曾、李修凯、周广达、袁寄滨、乔家才、王清、史泓等都是甲训班毕业的。乙训班训练行动和警卫特务以及汽车驾驶员，易学忠、孙超、陈清、吴瑛、黄土钦等都是乙训班毕业的。丙训班训练理发和一般工作掩护任务。电讯班训练电讯机务、报务人员，是为特务处电台布置和通报服务的。浙江警官学校虽不是特务处的外勤组织，但完全是特务处掌握的训练机关，特务处的发展，与浙江警官学校培养的骨干特务是分不开的，浙江警官学校可以说是特务处的发祥基地。

### （五）南昌行营调查课的合并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邓文仪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他是非浙江籍黄埔学生中在蒋身边最久的一个，也是最亲信的一个。蒋介石一贯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时而招之使来，邓从来没有怨言，他还向人自夸：“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蒋介石虽然觉得他能力并不太强，但对他很信任。1931年，邓收罗了一些曾留学莫斯科的中共叛徒和托派分子，如王新衡、严灵峰、陆遂初、程一鸣、谢力公等，秘密研究和准备建立特务组织。他向蒋介石提出，得到蒋的批准，就在南昌行营成立了调查课，作为特务组织的总机关，邓文仪自兼课长，秘书张严佛兼指导股股长，军情股股长李果谏、训练股股长谢力